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十二）

每当谈起一九六六年在中国大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常常会提到红卫兵。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这样记载：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北京百万人在天安

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到北京串联的各地红卫兵及师生（以后，七次接见，被接见人数达一千一百多万）次日，八月十九日北京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活动。此后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仿效。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曾经被称为红卫兵的节日。红卫兵制造的以红色恐怖为特征的“红八月”，究竟是怎样血腥的红色？对于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是记忆中永远无法被撕去的一页。但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却是难以置信的、朦胧而遥远的故事。三十三年过去，当又一个八月十八日到来的时候，让我们随着一段已经存入历史档案的实况录音，一起回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重新思索当年发生的一切。

主持人：在校学生以乱棍拳脚打死校长、老师和平民，这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象，在文革中却司空见惯。多年来致力于文革史研究、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博士，特别对文革中学生殴打校长、老师致死的案例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

王友琴：在这些年来，我跟数百名文革的经历者谈话，也搜集了文革时代非正式发表的各种文件和报纸。除了在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些已经被报告的文革一面之外，还有另外的一面。在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底，红卫兵组织在各个学校开始建立。这个时候，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暴力的迫害行为。首先是针对教员的，后来又扩大到校园之外。我特别要提到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那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在它的名字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卞仲耘老师在那儿被打死。她是副校长，因为当时这个中学没有正校长。这是历史的一个血腥的标记。从那天开始，好像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被一群人就这样打死，没有关系。在革命的名义底下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卞仲耘老师当时在这所中学已经工作了十七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这个中学的学生。从这个中学女教师的死后就标志着——一个深渊的开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

实际上，这件事情在八月五日大概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开始，打的过程，用棍子打，往身上浇墨汁，挂黑牌，然后被体罚。甚至有人踩在她的身上，过两个多小时以后，她已经昏倒在宿舍楼的台阶门前。这个时候被放到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面，可是却没有人把她送医院。直到晚上的时候才送到医院，医生说她已经死了大概几个小时了，她就是死在现场的。当时的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还有姓汪的副教导主任，他们都被打成重伤。胡志涛老师被打成多处骨折。在北京，卞仲耘老师是第一个教师里的受难者。当然，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师自杀了。但是，被活活打死的这是最早发生的。

主持人：现在在北京一家报社做记者的秦风女士，文革时是以上所提到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校长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三十多年来，秦风无论如何无法忘记她当时所感到的惊骇——

秦风：当时，我们都是初二的学生。从六月开始，学校就乱起来了，八月达到一个顶峰，那种激烈程度，现在叫恶性程度，当时说就是革命造反的那个“力度”达到一个顶峰。当时经常有这种斗老师啊、斗校领导啊，而且在斗当中就有一些打呀、甚么戴纸篓和泼墨水这种比较过激的行动，当时这种行动也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一帮非常斯文的、优秀的女校学生怎么会突然一天之内，天使就变成了恶魔，能用那么激烈的行动把一个女校长给打死。现在觉得好像是不可解释、不可思议。后来，包括出去串联，我见过很多的斗和打。我们学校也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嘛，那是宋彬彬在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以后，毛主席问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就说，还是“要武”。

主持人：无论是当年的中学生，还是文革的研究者，就算是当时最普通的北京市民，也忘不了在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候，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叫“宋彬彬”的女学生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的报纸、广播广泛地报导了毛泽东和宋彬彬的对话——

〔插播实况录音：（“八·一八”大会现场报导）背景音乐：“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现场广播员：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甚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现场播音员：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我们决心接过革命前辈的枪杆子，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我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们的统帅，我们甚么也不怕！〕

主持人：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一群女学生，以乱棍拳脚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长卞仲耘。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博士认为，这是历史的一个血腥标记。现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机构担任公务员的艾迪先生，在文革的时候，是山东省一所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回忆起当年北京的红卫兵如何到他所在的学校去“点火”——

艾迪：我从甚么时候自己的感觉有改变呢？就是从北京师大女附中有两位“女将”到青岛去点火。“点火”了以后，第一次是从打老师开始，又打同学。旁边有同学提出来（不同意见），马上就上去，就因为他说话，他就挨打。当然先要问甚么出身啦。我还记得，当时那位头头说，是“红五类”的就可以幸免，不是“红五类”的，那就打狗崽子。红卫兵实际上就是兵和匪的结合，所以他们当时抄家，他们就说了算。他们比政法机关还厉害。政法机关起码还要罗列甚么罪名，他们根本不用。只要有一个学校一个介绍：这个人家可以抄，马上就去了。比较凶的是前面那一拨儿，那一拨儿实际上不是一日之功，那就像当年的希特勒一样。

主持人：现在在美国一家公司担任经算师的陆文禾博士，文革的时候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六八届初中生，他也谈到上海的红卫兵当年如何效法北京的红卫兵——

陆文禾：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这是全国范围的。那个时候，我只有十三岁，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八·一八”之前，我们班里有一个同学，是干部的孩子，叫白晓苏，他的哥哥叫白晓鲁，刚刚从北京回来。那时候，所有的干部的孩子都穿上黄军装了，我们就感觉跟其他不穿黄军装的人不一样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就说，他哥哥刚从北京回来，北京的红卫兵都很厉害，他讲话的时候是非常羡慕的。我们当然也是很注意地在听。他说，北京的警察根本不敢管这些学生，这些人把地主揪出来，皮带拿出来，打死。他意思是说上海非常落后，应该效法北京的红卫兵那样做。上海跟其他各地一样，想办法紧跟北京，步子总归比北京慢一点。后来就开始打了，当时就是有“红五类”嘛，是以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作为标准，所有“黑五类”的，就是打死了也不足惜的。当时在学校里面，老师挨打。我有一个老师，教地理的范湘叔老师，当时他就有六十岁，他教地理教得很好的，但是后来听说他是地主，所以很多人打他。

〔插播文革歌曲：“红卫兵，红卫兵，伟大的统帅是毛泽东。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毛主席的话我坚决听。举红旗，擂战鼓，赤胆忠心闹革命，早晨的太阳光芒万丈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

主持人：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成因究竟是甚么？这是专家学者们非常重视的研究课题。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丁抒博士根据一些已经公开的和尚未公开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丁抒：由于《人民日报》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转眼间，“破四旧”运动就燃遍了全国城乡，并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恐怖。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致死，是需要有精神支柱的，他们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逻辑简单易懂：只要杀的是坏人、牛鬼蛇神，那就是革命的行动，就是好得很。北京一二九中学的学生抄原中央工商管理局副局长千家驹的家时，一边抽打他，一边说：“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八月三日，江苏省红卫兵大造反，将省教育厅局长吴天石及其夫人拖出去斗争，并将夫妇二人活活拖死。是年，南京师范学院甚至建了一座毛泽东塑像纪念这“八·三造反行动”。毛泽东知道打死人的事情后，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发给党的干部。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的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江青传达的，稍有一点不同，“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既然红卫兵是好人，牛鬼蛇神是坏人，红卫兵打起人来便更加有恃无恐。比如，兰州大学学生在鞭打牛鬼蛇神的时候，他们常常念毛主席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

八月四日，江青和康生等人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工作组。江青在台上指着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大骂：“你是别人养的一条狗。你狗仗人势。”当学生用皮带抽打张承先的时候，江青、陈伯达等人就坐在主席台上，无动于衷，等于纵容学生。中共中央里没有人出头制止红卫兵胡乱打死人的行为。后来，叶剑英元帅接见学生代表，一方面说，随便打死人也不对。另一方面又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们。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应在二十万人以上。

主持人：在文革研究专家王友琴博士的案头，有一份长长的红色恐怖受难者名单。

王友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第二天，八月十九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学生斗争他们的老师和北京市教育局的一些干部。所以，那天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当时八中的校长叫温寒江，昏倒在血泊中，就在这个舞台上。八月二十二日，北京女三中的校长沙平被打死。北京第八中学的书记华锦被打死（有说是被殴打后自杀而死），化学老师韩玖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得了败血症，几乎死掉，以后终身残废。在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有三个老师被打死。八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真先被打死。

这里所说的只是我现在了解的一部份的名字。除了老师，这种残酷的暴力迫害，也施加于学生。因为当时流行一个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也被打和被污辱。在北京第六中

学有一个学生，叫王光华，就被打死；在北京第十三中学有一个学生叫武素鹏，也是被打死的。

我们知道这个红卫兵运动是发源于北京的清华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附中。在清华大学附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晚上，在一个斗争会上打了一批老师。会后，一个物理教员叫刘树华跳烟囱自杀了，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第二天，在北京大学附中附近住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的工人叫陈彦荣，他下班后，和他的妻子一起被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拉到学校，打到半夜，他就被打死了。在那一天被打死的也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是甚么现在也不知道，因为在文革以后，也没有家属来告诉这个死者的名字。根据当时内部的一个报告，从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底，在北京被打死的人是一千七百七十二名。有的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比这个大，不管怎么样，一千七百七十二人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而且他们是被棍棒、拳头杀死的，过程可能是长达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最高峰的时期就是在毛泽东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之间，也就是在八月十八号和八月三十一号之间。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不仅在北京发生，也在外省发生。在厦门第八中学，有两个老师叫黄祖彬和萨其琛被打死；在南京第二中学的一个老师叫朱庆颐，也是被打死的；在上海、在广州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死的都是一些普通老师，正因为他们是普通人，所以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应该被我们记载下来，因为他们的命运和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更加相关联。

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发生了甚么事情？应该正视事实，这是最重要的，没有理由来隐瞒这些事实。记住这些死者的名字是表示我们对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也是为了让每一个活着的生命能够得到一种平等的保护。

主持人：这位文革中北京四中高中学生牟志京，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从事教学研究，他在文革中曾经创办《中学文革报》，刊登过遇罗克的《出身论》等多篇文章，牟志京博士回忆起三十三年前的红卫兵和“红八月”——

牟志京：很快的就是对学校领导、对教师的批判，把一些校领导、教师集中起来，剃头，往身上浇尿、浇尿，泼墨汁、浆糊，当然大字报更不要说了，强迫他们说一些污辱自己的话。然后红卫兵成立起来，很快跟来就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逼迫出身不好的同学讲自己是混蛋。当然后来“八·一八”的检阅，在这之后更是威风，到了“红八月”的时候呢，红卫兵带着袖箍，又到街上去抓很多人。我们四中也有了小监狱，从小监狱里每天不断地传出人被打的时候的号叫，在这个小监狱里，比较确实的消息，至少死过两个人。

我也见到过他们从校外抓的一些女生，因为四中没有女生，把她们弄到校长室，当然校长已经被赶出去了，让她们撅着屁股，拿着武装带抽她们的屁股。红卫兵在街上“破四旧”非常凶猛，在学校把图书馆的书堆起来烧掉，花园里边的花拿武装带抽掉，在街上去剪女人的辫子……当然很多人家被赶走了，很多人被打死了。

也就是一年之后，曾经有一次在护国寺小吃店，当时我跟我一个朋友说，不知道“红八月”到底死了多少人，当时我说了一个数字。旁边桌子上一个中年男子就冷笑起来了，说：“你这个数说的不对，我是火葬场的司机，当时火葬场的车呀，每天二十四小时出动，原来都是一个车拉一个人，那时候每回都是把车整个的就给塞的一点缝都没有，就这样，死尸也拉不完。”

〔插播文革歌曲：“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较弱为背景音乐）淡入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检阅百万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周恩来讲话录音：（嘶哑的嗓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主持人：丁抒博士详细研究了这天天安门城楼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细节——

丁抒：八月十一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以前，中央作了学校九月复课的决定，如果学生们都回到学校，走向教室，文化大革命将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但是毛泽东个人的一句话，就推翻了中央全会的决定，毛泽东要借助学生，把已经点起来的火烧遍全国。这个算盘，聪明如周恩来者不可能看不清，他不希望学生卷入中央的权力斗争，他想把学生请回校园。

“八·一八”大会进行的当中，周恩来找到毛泽东，说：“主席，一些北京的学生说，外地大中学校的同学纷纷来到首都，是不是会影响首都各学校的教育改革？人多了，食宿、交通都有困难，九月份以前学校复课恐怕不易实现。”周恩来的目的是想得到毛的一句话，动员他们回去，有了这句话，周恩来就会果断行动，先利用北京学生将外地学生送回去，再将北京学生请回校园。但是毛泽东回答说：“不要紧，群众目前只是刚刚发动起来，搞革命就是要搞串联，大革命就要串联，恩来，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是就靠串联才搞到一起吗？北洋军阀虽然有枪有炮，可是全国的学生团结起来，他们就没有办法。”这时候毛泽东说的“北洋军阀”，实际上是刘少奇、邓小平。对周恩来来说，毛的话比党的决定更重要，他的任务是执行毛的指示而不是党的决议，只要毛有了指示，中央全会的决定就可以不作数。于是，周恩来马上应诺：“那好，我去安排一下。就转身走开了。”

【插播实况录音：（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

周恩来讲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掌声、毛主席万岁”口号声）我们要知道，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掌声、“毛主席万岁”口号声）我们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在全党、全军、全国进一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的群众运动，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我们要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给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群众口号声）】

丁抒：毛泽东为甚么不让学生回学校念书？人总要有事情干，毛泽东已经决定将刘少奇的问题捅开，让学生充当马前卒。在“八·一八”大会上，北大附中红卫兵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了话以后，见到刘少奇，后来他有一段文字记述了那随后的一幕：

“我兴冲冲走过去，颇不懂事的给刘主席戴上一个红袖章，并且汇报说：刘主席，您知道吗？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戴这些袖章，就是仿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的纠察队，（因为刘少奇是当年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点了点头，嘴角微动，权作回答。我似乎感到有点甚么？……他心情不好，于是我跑回毛主席所在的城楼会客室，问：‘毛主席呀，刘主席怎么好像不开心呢？’‘嗯’，主席沉吟了片刻，‘他吗，他不支持你们。’”

毛泽东将中央高层领导的分歧透露给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这是中共四十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事，毛泽东显然下了决心，要将刘少奇的问题捅开。他不惜践踏党纪，他知道，要让红卫兵知道毛泽东支持他们而刘少奇不支持他们，火药包

就会爆炸，就会炸得天翻地覆，那时候刘少奇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

毛泽东点的火，确实最终烧死了刘少奇。煽动以彭小蒙为代表的那批红卫兵起来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毛泽东轻而易举的就做到了。把地、富、反、坏、右扫地出门，他们是先锋；斗争学校里的“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是主要打手；用乱棍打死老师校长的就是这批人。可是，他们是共产党的子弟，他们热衷于横扫的“牛鬼蛇神”，是不包括他们的父辈的。毛泽东同彭小蒙谈话以后，中宣部副部长熊复马上告诫她：“你要作毛主席的好孩子、好学生，要遵守党的纪律，今天毛主席对你讲的话，都应该保密，不要到处乱说。”

不仅仅因为遵守纪律，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不仅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也是刘主席的红卫兵，彭小蒙没将毛主席说的话透露出来。结果红卫兵都不知道毛主席、刘主席不是一伙的。所以当几天以后，清华大学内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起的时候，那批“子弟兵”就认为，那是“狗崽子造反，反革命翻天”，在刘少奇的女儿等高干子弟的接应下，他们于八月二十四日结成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杀气腾腾地开进清华园，撕毁了全部大字报。

毛泽东曾经认为，他可以借用红卫兵攻打刘邓的中央。北京高等院校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造反司令部”，称为“第一司令部”，毛泽东便让“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一司”。江青曾经找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说：“你们要支持‘首都红卫兵第一造反司令部’，要帮助他们解决车辆。”但过后，毛泽东才明白，“一司”是由高干子弟控制的红卫兵，干部子弟不会打自己的老子，他们控制的红卫兵组织，不是他所需要的队伍。于是，中央文革小组也就转而利用“三司”了。于是江青第二次指示傅崇碧，要他支持“三司”、“井冈山”，所谓“三司”，是平民出身的学生组织的红卫兵。自从平民出身的学生也组织起红卫兵之后，首都红卫兵组织的干部子弟就不再自称是红卫兵了，为与平民子弟划清界限，他们只称自己是“老兵”，这批“八·一八”大会的英雄，再也没有兴趣参与文化革命了。这些红卫兵，或者叫“老兵”，留下的历史痕迹仅仅是：打老师、抄家、砸古物、烧书画……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应当在二十万以上。

主持人：红卫兵运动究竟是怎么发端的呢？现在在德国的中国学者、自由撰稿人、台湾当代杂志编委仲维光先生，文革的时候是北京清华附中高中学生，中国最早的红卫兵，就出现在他所在的班级。

仲维光：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它和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关系。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就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集权主义。从开始的“三反五反”，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一个比较决定性的变化。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呢，我们这代人实际上就是在共产党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这种环境中生长的，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切都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实际上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六十年代初期就开始，这种集权主义走向另一个高峰，例如当时推行阶级路线，对文化领域里的一些个东西的批判。

清华附中红卫兵呢，我觉得完全是在六十年代，毛泽东的集权主义思想的道路上走下去的结果。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初中有一个同学，叫张坚，他的功课很好，但是在一九六四年考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家庭出身，没有任何的高中，甚至中专录取他。张坚呢，一九六五年，就又考了一次，又没有被录取，在当时才十五、六岁的孩子，就把这个张坚的精神真的就完全摧毁了。在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学生叫张明的，当时才十六岁，在我们学校呢，号称是“天才儿童”，他十六岁考中国医科大学，成绩非常好，但是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台湾，他也没有考上，张明当时就疯了，他要去台湾找他的父亲，在清华附中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

事件，就这一件事，把他一生等于都毁了。在当时的这种阶级路线，使得这两批学生：一般出身的和这些干部子弟，分成了两派。干部子弟，他们在北京市的各个中学咄咄逼人的进攻这些平民子弟，尤其是学习、体育、文艺有特长的人，都成了他们在学校里、同班里竞争的眼中钉。这种阵线的分明，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经逐渐形成了。

一九六四年，学校里就出现了一些小字报，要使学校里一切占据学校的所谓“领导地位”的位置都由干部子弟和所谓“工农子女”来占领。当然啦，他们不可能在文艺、体育和学习各个领域里头拔尖，因此就产生了和一般子女的冲突，他们呢，在这些领域更强调阶级路线、强调思想革命化。发展到一九六五年，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以后，当时第一个红卫兵是从我们班出来的。最开始他们提出的，跟校领导搞对立的口号，就是说校领导重用了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子女。

【插播文革歌曲：（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仲维光：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所谓老红卫兵，所谓造反，实际上他们在一九六六年初，甚至一九六五年年底，他们就不断的看到当时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讲话，以及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批示啊，或者其它的中央内部的动态。实际上这些红卫兵，他们当时完全是在亦步亦趋的跟着毛泽东的步调在走，我们这些子弟当然不知道这些个东西了。每一个毛泽东的这种新的东西的公诸于世，当然也都引起了他们的雀跃和欢呼。我当时很清楚的记得，每当一篇《解放军报》的社论或者评论员的文章出来的时候，他们在班里头都非常非常兴奋，在班里一遍一遍的念。因为他们的出身很特殊，所以他们能够弄到《毛主席语录》，当时就是小的所谓“红宝书”，在班里也觉得是高人一等。到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对他们来说，整个的形势就更加明显。后来呢，所谓“老红卫兵”，他们说，他们成立红卫兵是在五月二十五日，但是后来据他们里边的一个人，叫陶正，他讲，实际上是三十一日，他们写的这个东西，后来因为大家都说是五月二十九日，也就没人再追究这个了，但实际是三十一日。这两天的差异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三十一日，也就是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出来，几乎是同时，他们写的这个红卫兵的大字报，到了三十一日，那就说明他们完全是跟着毛泽东内部的消息来起舞的，并不是像有些人他们自己讲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产物。到六月一日以后，红卫兵才第一次正式打出来。

【插播文革歌曲：“红卫兵，举红旗，刀山火海敢上去，文化革命当先锋，扫除一切害人虫，红心忠于党，永远跟着毛主席，大风大浪无阻挡，文化革命定胜利……”】

仲维光：红卫兵的名称呢，张承志说是他起的，我想这是对的。他当时就讲：“就叫‘红卫兵’吧，我们要永远作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要保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前后，红卫兵当时就在清华附中和其他的学校，已经有暴力倾向产生，开始有了打人现象。到七月份的时候，党内斗争也比较激烈，当时毛泽东利用了刘少奇派工作组问题要撤工作组，毛泽东就要发动红卫兵小将来达到他的目的。到七月二十几日的时候，他们又已经获得了这种信息，他们开始反工作组。大概与此同时，七月二十几号，毛泽东在大会堂已经接见了一些红卫兵的代表，当然他们对这些动态掌握得很清楚。毛泽东七月底给红卫兵写信，毛泽东刚写了这封信，红卫兵几乎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已经知道了信的内容，更加放肆。到八月初，江青在天桥剧场接见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红卫兵代表，对他们的支持就更大了。从七月到八月，打人开始成风。清华附中在打出身不好的

子弟的事件也是在八月份出现的。到了“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就把他们的各种狂热推向了高潮，“八·一八”以后，到八月底，是北京打死人和迫害性最大的半个月。红卫兵把这个推动到社会上，去“破四旧”，例如，中国的很多庙宇、古迹，比如说颐和园吧，排云殿上雕刻的那些佛像，都被砸掉了，几乎没有一处古迹能够逃脱红卫兵的破坏。只有极少数的在当时被保护下来，说“不得进入”，那就是极重要的，绝大多数都遭受了破坏。而且当时焚书的现象是很厉害的，从各家抄家抄出来的书，送到造纸厂销毁，很多东西都荡然无存了。当时，大家就不断地听说，而且自己学校里也有同学因为父母是资本家，或者是有历史问题，儿子就把父亲打死了，或者女儿把父亲、爷爷奶奶打死的现象。大概在各个中学，都有打死人的或自杀的现象。在我们学校，当时就有几个老师在被打的过程中自杀。还有个同学叫郭兰蕙，说她是白专，说她是资产阶级情调，最后呢，郭兰蕙喝“敌敌畏”，不准抢救，死了。

（未完待续）

□ 原载《中国之春》

~~~~~

【专题研究】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浅谈 5 7 年和 6 6 年的大学生（连载之二）

• 漂 木 •

## ◇ 二、两代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影响

5 0 — 6 0 年代大学生，成长在红旗下，在意识形态上拥护共产党、毛泽东，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

他们继承传统，从知识分子的本能鼓吹科学与民主，尽管他们还不可能那么明确地表示出人性的自我完善、自我复归、价值的自我实现等等 8 0 年代校园时髦话题。

5 7 年之前，高校党委的绝对领导尚未确立。反右的一大实绩，是党的绝对领导在高校站住了脚。5 0 年代初，批判对国民党有幻想、崇美恐美、及思想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对学生有一系列思想教育，但宣扬无产阶级思想，未有 6 0 年代那么深入广泛。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只是开始作为一种主导的意识形态或学术思想产生兴趣。他们读了一些普及型小册子和原著，对某些原始教义有了了解。当时一些学生批评中共党员，就是说他们不是或失去马列原教旨的共产党员形像。他们不曾系统读过毛泽东著作，1 9 5 3 年“毛选”只出版到第三卷，1 8 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凭卷购买，只有学生中的先觉分子，认真读了马列原著与西方名著。多数知识分子，以一种纯洁的文化初恋心态看待马列主义，同时他们还承继着对西方文化了解认同的一面。3 0 、4 0 年代现代西方文化思潮与 6 0 年代不整合，是在 5 0 年代，特别是 5 7 年出现的。反右运动成功地普及了一个“平凡的真理”：批评党员、党委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说真话讲事实或是提不顺应潮流的积极建议也是反对领导反对党。“党”被抽象化为政治偶像（当时还不是毛泽东），“党”也被具体化为党员个体。反右和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使 6 0 年代出现了思想史上的大断裂。中外文化正常的交流渗透中断，中国现代政治民主的进程遭受大挫折大迂回。5 7 年形成的政治文化得以偏离、摆脱现代文明轨道迅猛扩展。张春桥、姚文元现象，正是 5 7 年文化的一种产物。

6 0 年代的大学生，青少年时初涉意识形态，恰好承接大断裂的文化成果。他们不了解老马克思，即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前的马克思，不了解马克思何以成为马克思。除重点文科大学对西方文化略有介绍，一代人与西方文化隔膜。同年代的日本

、法国学生则与中国不尽相同。所以红卫兵运动和国外的校园风暴，思想形式背景貌似而神异。海外人文主义泛滥，神州大肆伐扞人文。诚然，60年代人曾仰慕崇尚苏联，从苏欧文化也多少感触到一些人文主义的东西，在高校政治课中，正式开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共党史。但对这一代大学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毛泽东思想教育。恰恰是57年反右以后，中学生语文课与政治课教材，多了几篇雄文，它们是延安整风的纲领性文献：“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

57年的大学生恰恰没机会深读这几篇文章。57年整风反右和延安整风的内在联系，60年代人已默默领会，并融贯到对自己和别人的思想改造中，而且60年代大学生还系统学了反右的纲领性文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1964年，他们又学习了刚刚公开出版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说反右运动的精髓，他们在中学时代就熟读，在大学里又系统领会了。

整个红卫兵一代的政治初恋是在60年代非同凡响的政治激荡中进行的。他们比较清楚中共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策略，他们卷入文革并非简单受蒙蔽，正是57年文化造就了红卫兵一代的逆反。复旦大学红卫兵安文江写的“我不忏悔”一定程度披露了这种前文革文化，安说1957年后，“学校象教堂，老师象牧师，学生象羔羊”，一代人的中学时代是“思想被强制，天性被压抑，个性被扭曲，灵魂被净化的自得其乐的痛苦时期”。有悖人性的政治教育，滋生了激狂的红卫兵。（13）

红卫兵最喜欢的毛泽东激励一代青年的话语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那个年代，青年人唱起李劫夫谱曲的这首歌，都为伟大领袖博大的胸怀和自己的任重而道远激动得不能自己。红卫兵现象决非青年纳粹那么简单，其中不少人至今仍洋溢着当年跟随伟大领袖的青春激情，为国为民蹉跎无悔。不过这一代人到今天也太少研究第三帝国的精神文化，不懂得何谓社会法西斯主义。一些曾遭受伤害的老文化人的回忆录则频频提及，老五届里有伤天害理行为的人至今没有悔意。

受到过文化革命冲击的干部，心理并非都平衡，有的希望回到17年体制，甚至回到57。时过30年，文革情结仍未了却，民族心灵的伤痕远未愈合。

毛泽东的诗词、以上的六篇文章，再加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是红卫兵奋力投入文化革命的主导精神武器。毛诗词里凡能用的词汇短句，都被借用来作为红卫兵战斗队的队名，他们用这些去对付各级领导。他们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似乎正在做1957年大鸣大放一模一样的事？

区别仅在于，他们已在毛主席指导下作了十年的精神准备，57年人似乎听了“讲话”传达就热忱地投入了大鸣大放。

可是，57、59年反右的教训已铸就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挂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头上。66年的大学生们，虽然未能直接参加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但他们都接受了以上那一系列文献的概念，都能感知“反党”这噤若寒蝉的气氛。父兄、家庭及其它社会关系在两次反右运动中的遭遇和升迁，不能不浸润他们血气方刚的青春。犹如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上升路线”时形成的红色恐怖，已紧张他们的神经。首先起来给党领导（单位领导、工作组，后来是中央部门及地方党的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人，从一开始，他们就笼罩在57年的阴云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绝大多数，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又一次反右运动，或者是故意把运动引入反右的轨道。几乎各中央大局（如中南局、西北局、西南局等）在中共中央5月16日

“通知”前夕，都是布置在知识分子中再来一次反右派运动。“通知”后，由于对毛泽东的意图摸不清或者抵触，不少领导忌讳讲“走资派”，贯彻布置的仍然是反右，在人民群众中反右。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文革思想虽然是从延安整风、57年反右59年反彭德怀发展而来的，但是文革一开始，是戴上某种异传统政治文化的光环的，这也是他思想中两极的另一面。相反地，刘少奇与各级领导，却成了维护57年文化的代表。66年5—7月的政治气氛不亚于57年的夏季，历次运动形成的“当然左派”，也时刻准备批判、监视或是围攻他们认定的右派分子。

从中央各分局、中央各部开会回到大学的书记们，向党委委员和总支书记们强调，这是57年的形势，要和彭真、邓拓黑帮，和知识分子的右派作斗争，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到保卫院党委。在北京，高校党委在66年6月大多瘫痪，但在地方上，高校党委得以与省委工作组联手组织反击学生“右派”。中南局书记王任重搬出1957年划分右派的几点意见，指导反击运作。7月3日，王指示湖北：“差不多一切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引蛇出洞，好打。”“有条件就把左派队伍组织好……抓住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彻底斗倒斗臭……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水院可以把最坏的学生揪出来，集中的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已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王，从北京传回的实际是刘少奇的策略，以至到九月还表示对毛刘争夺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要秋后算帐。刘少奇也低估了这一代人。各高校学生的中坚分子，即少数派，有不少甚至在4月批判邓拓时，就在图书馆书库中搜寻了有关57年反右的文献：人民日报社论集、右派分子言论摘录、批判右派的典型发言、大字报集……；系统地回顾了中苏两党大辩论的文献；他们已作了57年与66年的纵向、横向比较。特别是，他们参加过四清、社教，读过毛刘拉锯出台的“前十条”、“后十条”，反复学习第一次明确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二十三条”。他们已得出66不等于57的判断。虽然有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意当年右派分子的一些认识，但认定自己决不是57年右派，而且产生大批右派和进行反右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尽管领导与政工干部们的经验和组织教育约束着他们，他们还是与多数学生的认识相左。中间学生仍是小心翼翼，担心57年的命运降临自己的同龄人，这主要是有复杂社会关系，已有57年伤痕意识的那些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子弟，以及不乏人道色彩的许多工农、干部子弟。

文革初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就是抓叛徒出名的那个学校）、天津大学“9·13”战斗队，在去北京上访的路上，就有人暗暗嘀咕，不是左派，就是右派的命运在等着他们。（14）其实，66年所有站出来的大学生、干部，乃至工人都想到这点。可见57年的运动虽早已结束，“余威”仍震撼殊俗。

在6—7月，许多学校的工作组出面（或党委出面）把最先起来的甚至还未起得来的学生与教师打成右派、反革命。不过中共中央从未承认这场“反右”，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写的大字报中称其为“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又称镇压学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不是1957年的毛了。他启用在57年被打击的力量来打击66年的刘少奇；他更新了57年政治文化的武器，装备了65—66型的炮，而完全扮演悲剧角色的刘，还操着57型的枪。当然，毛的思想与57年完全连贯，而非对立。不过在现象上看，大学生似乎成了66年的“革命少数派”，即“革命造反派”。

仅仅北京24所高校，就打了一万多学生右派、反革命。若以每校平均四千学生计，右派比例也大于1957年了。广州、武汉、西安、兰州、上海、南京大学较多，情况与北京不相上下。而且花样颇具地方色彩，除了“假左派、真右派”、“游鱼”之外，还有反革命、孝子贤孙、黑鬼狗崽子等等。应当承认的是，学生里左中右名单，早在5月、6月初已拟就，他们造不造反，都已面临当右派的命运。又有一批人站在地狱滑梯的入口处。不是造反导致反右，而是不得人心的反右促进

了造反，刘落入毛的陷阱，客观上帮助了发动文化革命的毛。

这就是57年的文化遗产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共建了这一精神财产，这应当也是中共自己和中共治下青年学生的整体悲剧。实际并不限于学生，全国文化界、机关，乃至企业，都有一大批决非群众而是党委抛出来的政治运动祭品。同时，天生的一批人随时准备听从党召唤，向另一批人发起政治讨伐。四月中陶铸还在中南局部署学术批判，五月点名批判文艺界秦牧、欧阳山，批判影剧界人士、作品；他调北京居中央文革顾问，还指示广东：“这次运动‘右派’的控制面比57年的要大”。后来他被学生骂为“最大的保皇派”，但他还想跟上毛，12月时不得不承认，湖北省委执行了资反路线，王任重7月3日的信，全省打那么多右派反革命，抓“南下一小撮”，“是很错误的”。要写一部66年“横扫”时的“中国的悲剧”，震撼程度定会超过德莱赛的“美国的悲剧”。但在文革后，披露当年高校再祭反右旗帜事实的文字，实在鲜见；当然也竟有文人把这一段运动过程，说成是将文革引导入正轨。不过，当年身临其境的那些学校师生，无不领教了让毛愤怒的“白色恐怖”。

这种政治文化的受害人还不完全是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还有积极参与迫害别人的一些青年，他们热衷于惩治同类，以证明自己革命的纯正，来谋取政治利益；从而扭曲了自己，也伤害了自己。57年以来总是这种人获得了历次运动的成果，政治伦理与社会价值长期错位，优秀者被淘汰，低劣平庸者则往往得到升迁。只是被迫害者始终不能放弃反叛这种文化的决心，其殉难与殉教，加大了与这种文化的疏离，导致40年和30年后，历史的回荡仍不绝于耳。中国人在革命时，总爱不断回顾历史，正象马克思讲法国人在革命时总摆脱不了雅各宾、老拿破仑的影子一样。文革中人们回首57历史，57年政治文化贯穿十年，乃至影响对文革人物的评说。显然，用造反不造反来界定文革中的学生群众，是荒谬的观念文化的反应。因为57年历史的梦魇始终贯穿文革。而且，被排斥、被压制、被镇压、被专政的命运总笼罩在这一批人或那一批人头上。

57政治文化被大学生狙击，更体现在反对所谓“党的领导”，“党的组织原则”上。被党委组织起来的左派队伍理由充份：右派学生反对了作为实体的党、她的各级组织；而他们反击右派学生依据了组织原则和上级指示、精神。57年来早已形成：批评领导无理，造反更是反动。在蒯大富们找到“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招架和回击时，毛泽东8月5日及时地告诫全党和愤愤不平的大学生：“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坚决抵制”。而什么是革命什么是错误，其解释权正在毛的手上，且造反学生也高举毛的旗帜，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从“当然左派”手中夺取了这一解释权。57文化戏剧性的发生瓦解迹象，当年曾潜心研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大学生，进而批判所谓“驯服工具论”，“入党作官论”。57年的英雄形像，几乎声名狼藉。要拥有文革解释权，就必须掌握宣传工具。大学红卫兵利用夺得的舆论工具——报刊、广播、宣传车，特别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大字报，年青人的创造性和破坏力充份显示，而且影响文革局势达两年之久。这是57人鼓噪一时的“新闻自由”、“舆论自由”大民主，但当时没有实现的东西。

毛远新是文革中风云一时的造反青年，作为毛泽东的亲侄儿，他的造反与一般学生确有不同，而且他是65年毕业生，从部队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文革。他那篇著名的“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客观地解释了运动初期为什么群众会响应号召造反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到学校，都有人推行错误路线压制群众，保护自己，一个原因是“在党内不取分析态度，绝对盲目服从上级的思想，而对群众习惯于用对敌人的手段”，“几年来我确实为领导整过不少人的黑材料，抓住别人的毛病，偷偷向支部汇报，有时先定了框框再有选择地搜集某人的材料”；这一套是“学院长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其二是个人私心杂念在作怪

……宁可政治路线上犯错误，也不能在组织路线上犯错误”。“何谓保守？就是我在优越的整别人的地位……维持现状保住尊严……何谓造反？就是他们在政治上常常处于受压状态，领导上不满意，被人看不起，三好、五好、骨干从不沾边，往往他们处于群众地位，对领导错误看的真亮，就要提意见，结果反而受压制……”。其实在哈军工这种学校，所谓的落后学生，多是普通工农子弟和散漫些的干部子弟。哈军工的现象，在60年代高校有普遍意义，涉及到政治、组织体制及学生教育中一些落后愚昧的东西。思想教育竟会走向自我封闭，走向扭曲人格。

群众的自我认识始终未结束。激进的红卫兵，他们中的激进分子，即对传统文化体制不满意的分子，认为毛泽东革命理论中的敌友在发生变化，一些属于异端思想的派别，提出阶级关系变动论，甚至提出党的上层官僚化的观点。不仅是湖南“省无联”，实际上，各地都有类似这样的派别、思潮，清华井冈山分裂成“414”与团派，也是传统与异端在阶级关系、政策问题上分歧所致。在每个思考的红卫兵心中，两种认识在争论、拉锯。继续革命理论，成了异端之源。

1967年河南有一民谣：“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这是传统者对郑州联合起来的造反组织的阶级分析，这里的牛鬼蛇神，不仅指右派、反革命、地富资本家。就学生组织而言，学生中是不会有地富资本家的，真正的反共分子极少。社会上的老五类分子，左右不了红卫兵。河南的现象实际上是有普遍性的。据说成都军区发现，造反派中20—30%的成员有政治和出身的问题。广东的军人调查发现，中山大学那些1949年前的知识分子，“多站在造反派一边”。（15）大学红卫兵中的一些思想者，亦私下暗暗议论造反派与57年右派，都批评院领导、组织社团，都企图占广播台、院报院刊，57年除了极个别真的公开叫嚷要杀共产党的人外，当时学生的行动比之于文革造反派，应是小巫见大巫的。

文革中大学生的派别问题，部份地反映了过去社会秩序各阶层对中共阶级路线的看法，特别是与57政治文化的某种对立。因为不论是那一派红卫兵，都在思考、分析神圣的文革。少数派学生拥护毛泽东，从狭义上讲是毛解放了他们，若不批判刘少奇，文革按刘的指导思想发展进行，他们就成了新的右派分子、新的阶级敌人！他们从批判资反路线，引伸扩展到对中共十七年的大怀疑。另一批人从怀疑文化大革命，到怀疑中央文革，进而怀疑毛泽东。造反红卫兵，普遍地讲，对批斗知识分子、对批斗老“五类分子”“死老虎”兴趣不大。在个别情况下，他们主动去审视重要的干部右派冤案，乃至结合这种干部（武汉两个学院有学生曾通过省革委会去为两名副厅级右派摘帽），一般决不会去平反右派，他们自己是左派革命者，不愿与右派沾边。在批斗走资派时，他们也会拉出反动权威、老右派陪斗。个别已摘帽子的右派分子如部队诗人白桦，曾积极投身文革，热情讴歌武汉革命小将，但是江青不客气地敲了他一下，警告红卫兵不要和这种人来往。老右派及那些年不走运的人，只是暗地里与红卫兵零星接触，即使他们不同程度地同情这些学生，也不敢如多数城市的干部、工人那样公开政治意向；同时也暗暗流露出对形势、对阶级关系变化、对无法制的社会现实的担忧。对于国学大师陈寅恪（57年未打右派），中山大学红旗红卫兵应当是策略的了，尽管也批；但陈的彻底消亡，却是在造反派“中大红旗”消亡之后。复旦大学的老右派王造时（民主七君子之一），最先不是复旦“红革会”红卫兵去抄家、去进驻，而是红色风暴“红八月”的中学红卫兵抢了先。老知识分子受到普遍的严重冲击，屈于由党委、工作组主持的“横扫”运动初期和军、工宣队进驻时的“斗批改”高潮。高校教师中老“牛”们，一般不参加战斗队，有一点要说的是，他们至少是为了造反者清白、轻装一些。但是其中不少人，的确为66年不知天高地厚的牛犊捏一把汗。红卫兵几起几落，可以说度过了好几次57年6月！78、79年，老右派分子一一平反后，见了已过而立之年的学生，才敢公开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不过到了78、79年，造反派红卫兵已尝尽“旧鬼烦冤新鬼哭”的苦头。但还有不少人仍不太明白给右派摘帽的个中秘密，未真正懂得1957年，更不了解老右派的心态，当然有人认为平反是倒退

，是对中共历次运动的全盘否定。反过来，一些右派们，也不能谅解文革中叱咤风云的红卫兵，特别是那些不在高校生活，甚至隔绝于社会的人。悲剧中人，一时都脱不出“此山”来静观中国党内外知识分子及中国政治文化历史长河的整体悲剧。

刘少奇、邓小平当然决不会认为这批学生是革命的。他们自然想不到，红卫兵狂热否定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思潮与80年代改革开放的关系。也可能邓在江西时和再一次领受毛式斯大林主义惩戒时，终于悟到社会主义民主与彻底否定苏联模式的关系。57人首先被唤回政治、文化生活时，他们的子女、弟妹兵正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的声浪中重新定位。实际上，这批人由于命运的颠波，在文革被政治否定之后，大多与邓小平提倡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红卫兵运动在68年结束，一批批活跃分子一次次受到清算，也令平庸的中国人深信，57年的规律是铁定的，当然要秋后算帐的。一位人文学的博士坦诚地说，激进的大学生，实际上就是当成了右派，他们遭受了当年右派学生的种种身心的凌辱。毛的文化革命在政治形像上的全面失败，也似乎凝滞了57的时空。但毛的红卫兵没有料到，恰恰是文革的政治结束，加速了57文化的衰落。

红卫兵在66年表现出一种思想自由化，即“怀疑一切”。本来，这是马克思与小燕妮在轻松的谈话时，无所泛指，提出对科学、真理追求的一种个人意向。红卫兵将其引入政治斗争，客观上是文化革命初搅乱秩序的需要。文革派的领导人，出于政治需要，当时煽动大胆怀疑，放任红卫兵为他们火中取栗。红卫兵在文革的前三年，怀疑了除毛泽东以外的一切人，实际上到最后也就怀疑了毛泽东。因为整整十年，各阶层、各种倾向的人都在政治走马灯上走了一趟。革命与反革命莫衷一是；真诚被亵渎，热情被践踏，神圣被撕裂。当一切都被相继怀疑和否定掉，最后就轮到毛泽东主席自己。林林总总，不能不说是中共政治权力、中国政治体制、政治信念的动摇。正是在对它的否定之否定中，出现了思想解放，出现了改革开放。这是超出了1957年的群众心态与言行的。发起和抵制文革的中共领袖都不可能预见社会合力的结果是这样，但其中的一位邓小平20年后承认，文革是共产党“自找麻烦，自招灾难，自食其果”。而且实行改革开放，“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16）

但是，红卫兵，特别大学生红卫兵的兴起，自发中是有着自觉性的。他们自发与自觉的基础，除了共产党的政治教育，还有什么呢？历来的大学生天然的是趋向于民主的，科学、民主是校园的主旋律。红卫兵运动也包含了对旧文化，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变革的微茫要求。他们恰恰在文革的高温和失败里逆向反思，对中共政治文化有了不同的认识，甚至从本质上不同意57年反右。57年与66年的联系是非常微妙的。66年人的初衷，既是传统的也是反传统的，但传统的包袱或许多于、重于57年的大学生。57年大学生精英许多超时代的呼唤，红卫兵作了两端的体会，有时甚至是批判。但两条思潮澎湃的溪流，终究汇入民主、解放的潮流中。

### ◇ 三、社会和政治问题困扰的两代学生

进一步了解两次运动前，学生群众心理的建造，社会心态的形成，有助于认识两代人。

56、57年学潮是50年代初那个时代，特别一系列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苏欧风波及种种社会现象在民众、学生心理的折射；65、66年学潮是多年以来，57、58年的文化、政治运动、三面红旗运动、反右倾、中苏论战、社教运动在工农群众、中下层干部中作用的结果对学生的折射。57年的热门话题是党群关系，执政党在社会中的位置，中共与右派学生的分歧正在这里。实际上，毛泽东在60年代越来越强调的共产党可能异化，

57年已有端倪。同时，各种运动早已影响、激荡着社会各阶层，许多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刺激大学生的政治心理。的确，56年是多事之秋，波兰、匈牙利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学生，批判斯大林隐隐约约地传入学生耳朵，大学生开始审视中国现存体制。毛几乎象80年代初中共对团结工会一样，开始对波匈民众寄予某种同情，反思执政党的问题；但很快就与中国民众得出相反的结论，从闭口不语到开始谴责，强烈反对非斯大林化、非社会主义化。毛泽东本人早就意识到中国与东欧有共同的问题。中国党群关系变化，工人请愿、农民闹社成为一种社会表现。中国的工潮，此时还仅在中小企业出现，国营重点大企业未卷入，这与工人的结构、素质、社会地位有关系。农民闹社，大致反映了生产关系剧烈变动、统购统销、农村干部蜕化变质的问题，也反映了对农业合作化持怀疑态度的较富裕农民的心态，农民不满合作社控制了农村经济的自由发展。

学校学潮也在56年达到高峰。因为对课表不满，北京地院学生贴出大字报，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把官僚主义者赶出学校，参加者达500多人。南京航院学生因面临中专生待遇而罢课抗议；兰州林校学生罢课，三百多人中捕了23人，隔离35人。据团中央统计，56年下半年发生学潮事件30起，参加学生达一万余名，这是建国后第一次非共产党组织的广泛学潮。（17）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是57年公开报导汉阳一中学生因升学问题闹事游行，最后枪毙了教育局副局长、副校长、副教导主任，抓了几个学生头头。在鸣放热潮中，学生代表人物林希翎，从阅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提出对体制、对民主与法制的新见解。谭天荣则提出“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社会主义民主万岁”的口号。（4）

实际上57年知识分子的躁动，反映了对文艺界人为宗派斗争扩展为政治斗争的不满，对社会政治现状的不满，对中苏业已出现的裂隙不满。深刻反映出法制社会、社会主义民主，对人文价值的超前追求。文革中起来的红卫兵，其先觉分子也反映了58—60年代国内问题、中苏分歧问题以及高校本身的问题。反映了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形式、手段的追求，对个体自由的追求。63年公开批判苏共，不论是非如何，都撕下了某种神圣帷幕，即共产党并非绝对正确，共产党也可以批判。中苏论战是文化革命争斗的前奏，也导致神坛的动摇。而文革则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

当时学生对教育体制不满，毛泽东几次对教育的评论传到学生中，激化了学生情绪。学生的怨气，不是发到所谓苏修和资产阶级身上，而是直对学校领导。66年6月，省委工作组在武汉水利学院全院师生大会上宣布毛泽东的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三千名学生，几百名教师轰地一下站了起来，鼓掌、欢呼雀跃，有的人还满含泪花。在那一瞬间，师生们把自己设想成应该属于无产阶级的，或已是无产阶级的。不论人们心目中的概念是什么，至少说明高校象一堆乾柴，充满着危机。

不仅教育问题与国际关系，国内社会问题也引起青年学生的关注。郑州群众组织“二七公社”的学生领袖叫党言川。党言川66年组织造反，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对他的人列举的一条罪状就是他给同学的信中，称三面红旗倒了两面，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了。他1962年2月23日说“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情况”。继而，66年9月造反派批判前省长吴芝圃时，党言川仍然用信阳事件饿死二百万人来攻击吴芝圃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河南造反派在否定文革初运动方向怀疑十七年时，首先攻击前任省委极左错误，同情的是57年以来“反右倾”受害者潘复生等的“反党集团”。而潘与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则在66年8月相继支持了当地的造反派而成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



但当时学生认识还上升不到怀疑三面红旗，不同意批判彭德怀的程度。不满与怀疑是客观存在的，特别在河南。河南高校不多，学生多来自工农家庭，他们亲身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的种种灾难，怵目惊心、难以忘怀。吴芝圃在批判会上承认：我对河南五千万人民造的孽，一辈子也还不清。要说的是，吴本人正是1926年豫东农会起家，毛泽东主办的农运讲习所第六期的皎皎学员。为什么共产党的官员会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触动初入人生的红卫兵。发人深省的是：文革从批判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开始，但河南文革，竟然与批判大跃进极左相关联。这点当然中共无法彻底扭转。康生在河南代表汇报问题时，一再点出党言川有反动言行，连支持造反派的纪登奎，每到关键时刻，总要念念紧箍咒，说党其人有历史错误。党言川在北京谈判和进入省革委会时，不得不公开作检讨。不仅如此，河南为武汉“钢二司”及“新华工”的大学生提供了四个豫籍红卫兵“司令”，或许也就是河南大跃进的某种深沉的文化回响。

清华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还有一条所谓钢鞭材料：他在上大学前，曾给中共中央上书，揭露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不只一个蒯司令。几乎大学生红卫兵的中坚分子，对中国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言论、行动。出于对中共的信任和血气方刚，他们往往以书信形式向上级乃至中央反映，并且认为这是宪法和八大党章赋予的权利。四川的造反派起来炮轰西南局、火烧李井泉时，不仅仅是批资反路线，群众从有关部门的造反了解到，四川在59—62年饿死上百万人！西北工业大学的姜明亮，中学时为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不积极，甚至被插过白旗；他虽不是红卫兵头头，而后曾上书中央批评林彪江青，是个思考的学生。武汉大学的杨家志，在四清工作队写信批评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所谓右倾言论，结果自己反被打成右派。60年代的大学生，多多少少都感到共产党——至少是基层干部犯了错误，往往从人文主义而并非共产主义的角度提出了问题。青年学生与老百姓，认为领袖是圣明的，下面干部办了坏事。当毛泽东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要反修正主义时，他们把来自中国老百姓的不满都倾泻到了中共各级官员的身上。甚至鼓动群众反对中共官僚主义的毛泽东，也感到震惊：革命成功了这么多年，党的官员在人民群众中形像竟这么差。这不是捕风捉影，李富春，这位1966年十一中全会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的人，后来在文革中并不理解与紧跟。但是他讲了一句中肯的话：“‘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干部？因为共产党欠的账太多了。”万里在安徽当书记时，眼看农民吃不饱，在国务院的高层会议上，曾尖锐地指出：“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18）应该说，在中共高层，前前后后，对于文革触及到那么多上层领导干部，有那么多民众起来造反，并不十分奇怪。一些被触及的确有错误的干部，多少也都有吴芝圃那样的罪孽感。大学生的朦胧不满，在文革的揭批中逐步找到答案，他们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分子，同时也揭露他们58、59年的极左。相比较而言，大学生总是单纯的，他们集中反映了各阶层的不满。所以不可能红卫兵造反仅仅是受了毛泽东的所谓欺骗的，如果要叫大学红卫兵的中坚分子说实话，他们不会承认自己受了骗。中国的民众用自己的本能和利益取向去理解、去诠释了毛泽东的意图，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首先是群众自我心态的一种需求，反修防修。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狂热，那么暴烈。其实，民众所谓的修正主义，往往指的是官僚主义，草菅人命。大跃进时非正常死亡是一个谜，文革中被间接揭露。个别省的公安厅内部造反的人或外部去造反的人透露了局部死亡数字。我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60年死亡率增加到25.4%，57、58、62、63年则是10—12%，出生率1961年降到18%，62、63年则是37—43%；西方的人口学家认为自58年到62年，大约有2700—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过量死亡，2900—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死亡。（19）当时的民众和红卫兵，实际上有意地避开了这个最刺激人最伤感的问题，避免自己的意识与海外反共宣传勾通，维系与中共的感情。可怜的是卷入社会生活的大学生们却多次被这个问题撞击心灵，每当发动群众忆苦思甜，年老的、朴素的农民不是说老地主多么坏，而是



自发地哭诉三年灾害饿死人、以至活人吃死人的骇人听闻的情景。问题不在于大学生有没有研究这一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

诚然，文革中学生的群情激愤，主要的还不是直接反映这类社会问题，而是学校中的不平静，以及学生介入地方后，与地方党委的冲突。不能忽视很重要的一点：对现实不满，不仅是造反红卫兵中的一些先觉分子。一些资料说明，一开始就不大赞成文革，特别是到了66年底明确不赞成文革的学生（部份是所谓保守派的先觉分子，部份是运动的逍遥分子），正是把文革与过去的历次运动联系起来，产生怀疑，没有盲目紧跟，这些学生有的社会关系中有以前运动（特别是58年以后）受挫伤的，如59年反彭德怀右倾时落马的一些中上层官员子弟。他们不满现状与造反红卫兵有所不同，造反派的先觉分子，其多数从马克思、列宁教义出发，把社会问题归结为党内思想不纯之上，认为经是好的，中下层干部和尚念错了，主张用共产党的传统，用57的办法用意识形态斗争的方法去整党，去纯洁党，以克服官僚主义与修正主义，他们自然与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论一拍即合。但上述所说的另一部份先觉分子，已开始不同意用党内斗争的方法去推进社会进步，特别反对群众参与党内斗争，所以从66年就开始怀疑毛泽东的路线，反对整肃刘少奇与中共高官，认识向前走，自然会倾向于用改良办法、完善的办法和经济办法解决社会问题。这一分野，也是50年代以来毛、刘分歧在学生观念中的体现。

对学生情绪冲击最大的是二件事，一是农村形势，人民公社试验的失败；另一件是国际共运分裂。苏共22大上周恩来的发言，向斯大林献花圈后愤而退席，无疑在60年代人们心中投下一枚原子弹。这代年青人只知道52—53年中苏蜜月、57—58批判右派反苏，对中苏两党的分歧根本不知究竟。读过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一书的学生，不一定比从内参上得知秘密报告的林希翎们多。他们是深受苏欧文化浸浴的一代，苏共曾与中共一样神圣可爱。中苏两党公开辩论开始，对苏共信仰松动，大学生中一部份人开始自觉地从哲学、从共运历史去找答案。无论是拥护中共，还是赞成赫鲁晓夫，或者持观望态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出现了：中共向何处去？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这是一次真正的解冻。学生在独立思考中判断究竟有没有修正主义，该不该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了该怎么办？意识形态上应该跟谁走？一些高校自发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有的在同校同学中组织，有的与不同学校、地区的朋友、老同学联系。时间大致是62、63年。但是，青年学生的举动一旦被学校发现，就会引起宣传、公安部门的注意。思想方面的动态往往以反革命活动为理由被监视。当时高教部、团中央收集了有关材料搞成内部参考报告。这些探讨理论的学生，绝大多数被当成敌我矛盾，轻的处理作内部矛盾，重的则坐了牢。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在北大哲学系组织X小组研究马列，居然也犯禁，连周恩来也不得不让步，指示公安部门安排郭去劳动锻炼。复旦大学68届的胡某，从另一角度介入意识形态辩论热潮，他积极投身于批判“合二而一”，被杨西光特许转哲学系。胡文革中成了“红革会”的头头，被张春桥压制下去。

红卫兵的崛起不仅仅是捍卫毛泽东主义的道义。在文革前业已处理的所谓反动学生，虽无机会发展为红卫兵领袖，但他们反映出一代人在思索。他们的内省与红卫兵同龄人的行动，是一件事的不同反映。如果说学潮，在62、63年已有无声的学潮前奏在暗暗起涨。如此“博士俱乐部”（而非裴多菲俱乐部），无论其倾向如何，一定会走向文革红卫兵运动的。

诚然，这些毕竟是极少数人的思考活动。但64、65年由中共自己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潮，64年春节讲话，之后高校出现了教育革命热，学生对教育体制、考试制度等等，都提出了疑问。教师也纷纷搬入学生宿舍，与学生“三同”，共商改革大业。64年中共组织重点高校学生按“前十条”精神参加了农村社教。社教文件中，大学生读了毛的批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65年又按“二十三条”精神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了农村“四清”，“二十三条”令学生刮目：运动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低年级则组织了到部队当兵。时值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声明、游行、集会不断；越战激化了美国的青年运动，也同时沸腾了心雄四海的中国红卫兵。种种活动，使学生人心浮动，而且相当一部份在农村第一线演习了向基层党组织夺权的本领。学生“四清”返校，正赶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后来就是批三家村。全社会充满火药味，校园里已放不下平静的书桌。

所以57年是自发的学潮工潮被毛激励走向了整风鸣放，66年是一系列中央有组织的学潮走向了红卫兵运动。这些学潮又始终与社会思潮激荡相联。红卫兵的崛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他们对中国现实不满，对官僚主义不满，对农村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干部作风、饿饭实际不满，还有对学校极左空气不满，或对工农子弟在学校中地位，或对贯彻阶级路线，对社会上存在的人与人平等不满……由中共揭示的对苏共不满从而对中共党员个人举止言行不满。如果忽视或者无视群众的这种心态，把文革历史归结为少数人阴谋政治，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起来自觉地受蒙蔽，为什么文革彻底失败会使中国走向改革开放？66年与57年的学生，自然有很多的不同，56、57年的学潮，实质上是从文化思想的解冻，反映出对某种秩序的要求；66、67年学潮，实质上是从另一次现象上反文化解冻和实际的解冻，逆反出激烈的非传统文化非现存秩序的要求，从而体现了思想的探索。57年“右派学生”的确真正体现了当年思想、文化的深度意义（钱理群语）；大学红卫兵的先觉分子，难道不算最先发出社会转型的分娩痛苦呻吟的前驱吗？文革在76年彻底破产，不是简单的毛泽东的失败或红卫兵的失败，而是思想探索走向新的起点。回到老马克思：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那些原有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那些革命政党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只有这些作为观念文化的东西，真正陷于灭亡，思想的升华，社会的转型才能实现。

大学生得知毛泽东67年2月对卡博、巴卢库的谈话，说以前搞了一系列运动，“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他们过去的一切不满，得到毛的肯定。即便毛泽东被人们再去批判十次，也很难对毛所指的“黑暗面”来一个反正。学生到了社会到了普通工人农民群众中去，他们知道了民众的疾苦，知道了真正的黑暗所在，所谓的不满，无非书生意气而已。他们珍惜自己的启蒙意识，争取社会进步始终不渝。

回头来看，毛泽东原意不乏社会变革的成份。而在运动的实际操作中，他主要是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包括把党政大权集于一手或转移到他放心的接班人手中；但红卫兵与工农群众，主要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冀希真正解决党与政府官僚化的问题。《参考消息》上曾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在苏联，一位教师在课堂上讲苏联这样好那样好，下面一个孩子放声大哭：“我要到苏联去”。大学生都心领神会这幅漫画。实际上，这一代大学生，生长在红旗之下，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敌人——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地主资本家，并没有直接斗争过。他们一面高喊阶级斗争，一面对这些人的对立情绪已淡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有许多烦恼和困扰，现实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应当说，是在这样一种潜意识下拥护毛泽东，推行文革极左路线的。从而，他们的抗争也没有超出体制的范围。

文革的一些激荡初始从农村中来，算不算一场农村革命呢？肯定不是。文革的确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学大寨等等去强化人民公社这一体制。但比较而言，文革是一场城市革命。文革前夕，全国工农业形势是较好的，机关、工厂一度出现某种秩序。从某种角度讲大跃进、人民公社试验的失败，成为文革的一条导火线，但斗争的焦点却在城市，在于毛希望的“污浊的”城市的革命化，在于毛泽东与红卫兵、工

人认为官僚主义者所享有社会、经济特权，在于党与政权革命性的蜕化。有讽刺意义的是：文革从批判彭德怀而引发，但毛泽东在66、67年依靠的红卫兵与群众的一部份恰恰是对彭德怀忧虑的社会现象不满的人，后者为了在毛路线一边争得自己的正统地位，又反过来猛烈地参与批判彭德怀、以及和彭同一辈的中共领导元老。原来跟随党的意识，忠实于57年59年政治文化原则的人，反而不赞成文革，反对在党内发掘滋生的新资产阶级，进而反对毛泽东。相比而言，传统观念上出身落后的阶层奋起的大学生，却往往企图找寻马克思主义，用辩证法、用原教旨去检验现实社会。

反映以上这些现象与事实，作为二十出头的学生来说，还是自发的或者半自觉的，他们仅是从社会现象来粗浅地分析政治问题。文革运动已经全面展开后，他们可能会从理性上去探讨这些。特别是67、68年后，从造反派红卫兵中滋生走向异端的思潮，如两湖地区的“省无联”、“北斗星学会”，从更原教旨的角度审视中共政权的阶级基础与合法基础，从而也触及到建国后的政治文化。理所当然，他们遭到文革派的迅速镇压，作为反动组织反动思潮被粉碎，连部份激进的红卫兵个人也只敢在私下认同他们一些观念。不过，经历数次反复，参加批斗人，自己又一次次被打成反革命，也逐步了解党内斗争的正面与负面。越来越多的激进红卫兵的人格正在复苏，他们确认革命性的衰退，思想的僵化始于50年代。这种蜕变恰恰建立在一批批忠于人民和国家的干部遭受不公正待遇和备受打击之上。他们开始发现，自己崇尚的文革，没有能解决社会的不公正，也铲除不了封闭的僵化的传统政治文化。后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山东大学“渤海战团”代表人物丘黎明等1968年就指出：“十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左倾是主要的，57年以来的反右、整风运动、反右倾几乎全错了……十七年来受迫害，受处份的大都是好同志”。（20）有趣的是，他们认为1957年“反右斗争是中国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夭折”。

红卫兵思潮——不论其那一派别，应该说都是中共政治思想的产物。其自我意识仍旧是维护长期以来宣传的革命准则与价值观念，但也同时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形式的一次追索。这种追索，不会是57年及80年代的求索的对立物。所以红卫兵有从众与独立意识的两面性。如果用“自由化”这一时髦的概括，56、57年肯定为一场自由化；红卫兵运动是否也是左的形式的自由化？若66、67年青年知识分子思潮，确实为一次自由化运动的话，应当说，毛泽东理想化的文革，结束了老一代的政治文化的生命力，也断送了1949年后在红旗下成长的整整一代人，这是他当初未能料到的。两代大学生对民主的追求，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是螺旋的；50年代人，似超前趋向于西方现代民主一些，60年代似更倾向民粹主义的平民民主，崇尚巴黎公社式的雅各宾大民主，有一定的区别。

当然，文化革命不应成为文化研究的禁区。作为思想文化史的对象，文革研究或许刚刚起步。中国人最崇尚历史，但却往往最不珍重历史，最容易遗忘历史甚至希望忘却。历史短浅的美国人反而珍惜历史，特别是历史教训。越战失误，已在当代得到深层次的认同，华盛顿的越战阵亡人名碑将历史的悲剧和丑恶，镌刻下来。纳粹集中营万人坑的墓盖，也镌刻上“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60年代人和以后的人，都不会忘却抛洒了心灵、血泪乃至生命的亿万红卫兵。红卫兵不会希望历史铸就一口大钟寺的哑钟。文革需昭示后人。在57年的“牛鬼蛇神”逐渐回复其人文面目时，抹去涂在大学红卫兵脸上狰狞的戏剧油彩，还需等多久呢？

不论如何讲，57年的问题今天逐渐清楚；但66大学生思潮，正和孕育和造就它的那场文革一样，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思想领域的文化历史问题，不是决议一下就可以简单作结论的政治问题。66年整整的一代大学生，除个别堕落的人，其绝大多数对于社会民主和社会公正，对于社会进步，态度应是一致的。他们人生价值观不改初衷，思想及心路可以用其后史来证鉴。他们今天的自我证明与自我实现，是否也说明为何他们面对蹉跎岁月，却申明“我不忏悔”。当然，作为事变中人

，他们大多已很难完全科学，公正地总结与概括历史。与57人，80—90年代人相比他们难免有不同的局限。历史似应留给后人评说。今天毕竟不是出马克思的时代，能在震惊世界的晴天霹雳的事变后，如写“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一样来及时写出理解的天才著作。

真理与民主的追求，必然是一个几代人艰苦曲折的去渐进的历史过程。  
(全文完)

注 释：

- (13) 安文江，我不忏悔，辑入千秋功罪，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P279  
(14) 青春的浩劫，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P28，P38  
(15) 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对立派系成因，辑入 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 P192  
(16) 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辑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P265  
(17)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18)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1996 P108  
(19) 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P101  
(20)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辑入文化大革命：史实和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 P259

其他有关资料取自文化革命中文字材料和向当事人采访、统计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cnd-cm@cnd.org>   |
| 本期校对：       | 叶森树（美国）  | <cnd-cm@cnd.org>   |
| 读者技术咨询：     | 月 边（芬兰）  | <cnd-help@cnd.org> |
| 网络技术维护：     | 张雨田（美国）  | <cnd-info@cnd.org> |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吕 青（加拿大） | <cnd-cm@cnd.org>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cnd-cm@cnd.org>   |
| 《CND》总编：    | 熊 波（美国）  | <cnd-cm@cnd.org>   |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ftp.cnd.org\[206.135.33.5\]: pub/hxwz](ftp://cnd.org/206.135.33.5/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 pub/cnd/hxwz](ftp://cnd.org/142.132.1.13/pub/cnd/hxwz)

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